

# 浙江八年抗战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下册：专题集



中  
5  
版社

编 审 杨福茂

主 编 包晓峰

副主编 黄梅英

## 下册前言

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它不仅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浙江人民经历了全面抗战的整个过程，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与全国人民筑成了反侵略战争的钢铁长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战火很快燃烧到浙江大地。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在杭州上空击落3架日机，首创中国空军击落敌机的记录。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江浙交界处的全公亭、金山卫等地登陆，随即其主力一部沿沪杭铁路南进，侵犯浙北地区。12月24日，杭州沦陷。仅仅一个半月时间，杭嘉湖绝大部分地区都沦于敌手。

杭州沦陷前，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各机关陆续迁至金华，并设省政府于永康方岩。至此，浙江的抗战形成了以钱塘江、富春江为界的隔江对峙的局势。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根据国共双方谈判协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1938年3月，活动在浙南地区的红军挺进师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同时为加强浙江党组织的领导，于5月成立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9月转为正式省委），浙江各地的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

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全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

1941年4月3日，日军为封锁我东南沿海，掠夺战略物资，发动了宁绍战役。包括绍兴、宁波在内的萧甬线南北的广大地区相继失守，原先隔江对峙的格局被打破了。1942年5月，日军为破坏浙赣铁路沿线的军用机场，发动了浙赣战役，浙赣铁路全线落入敌手。驻守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士，英勇地抗击日军，共歼敌两万余人，予敌以重创。1944年6月，日军为配合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发动了第二次浙赣战役，在龙游、衢州等地遭到浙江守军的顽强抵抗，战斗以日军退回原来战线而告结束。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指出：“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共江南区委及时组织浦东武装挺进浙东，建立了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队司令部，积极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收复国土，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努力发展经济，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教事业。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了我党领导的十九块解放区之一。根据党中央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1944年底，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到达浙西，与坚持在郎（溪）广（德）长（兴）地区的的新四军十六旅会合，建立了苏浙军区和苏浙区党委，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武装挑衅，浙西军民开展了三次反顽自卫战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在浙南，浙南特委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隐蔽斗争。1945年3月，根据华中局关于大力发展闽浙沿海的指示，成立了永（嘉）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浙江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浙东、浙西南新四军奉命北撤。

浙江是全国较早实现国共合作的省份，由于浙江省委认真貫

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由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抗日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浙江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最好的省份之一。国民党省政府在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帮助下制定颁布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参照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起了空谷足音的积极效应，成为当时浙江国共两党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帮助下建立的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成了浙江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基础。1937年底，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大批进步文化界人士聚集金华、丽水等地。他们在我的领导和影响下，出版、发行了大批抗战的、进步的书刊。她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参加抗日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1939年春，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浙视察抗战，他的浙江之行，对浙江党的工作，为增强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期间，浙江的中共组织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到1939年7月召开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已建有6个特委，50多个县（工）委，党员人数达19000余人。

浙江是全国较早沦陷的省份，也是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受战争灾难范围最大、最深的省份之一。八年抗战中，浙江全省77个市县，其中1市（杭州市）37县被日寇长期占领，31个县的县城一次或数次遭到日军空袭。日军在浙江各地制造了无数次大屠杀、大轰炸惨案。浙江又是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重点地区，造成无数百姓死于疫病。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同时为了促进浙江抗日战争时期党史和革命史的学习和研究，我们编辑了这本《浙江八年抗战》下册：专题集。由于资料所限，该书未能全面反映抗战时期浙江所有的重大事情。这些专题绝大部分都是中央、省、市（地）党史部门重点规划的。许多专题资料已在公开出版的书刊上登载过。有

些专题是在作者反复征求意见，作了修改后首次发表的，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又对史实作了进一步校核。由于我们掌握的史料不完整，加之水平有限，错讹、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亲历者及知情者不吝指正。

## 目 录

下册前言	.....	(1)
抗战初期的浙江国共和谈	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1)
浙江红军的改编和北上抗日	包晓峰	(10)
抗战初期浙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	
.....	顾春林 杨源时 冯宇苏	(19)
抗战初期浙江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省委的重建	.....	包晓峰(48)
新四军驻浙江几个机构的概况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59)
抗战前期党领导的浙江抗战文化	.....	金延锋(68)
战斗在浙西北的抗日游击队	.....	
——朱希、汪鹤松部队与我党合作始末	.....	
.....	中共桐乡县委党史研究室	(86)
抗日烽火中的浙江保育会	.....	沈才明(94)
1939年春周恩来浙江之行综述	胡廷钦 潘桂荣	(102)
1939年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	朱 健(117)
日本侵略军在浙江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	徐绍全(127)
日军在浙江的烧杀抢掠	.....	吴永良(142)
李友邦及台湾义勇队在浙江的抗战活动	.....	
——纪念李友邦将军诞辰九十周年	.....	楼子芳(156)

浙东抗日根据地综述	杨福茂(169)
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略述	杨福茂(190)
浙东抗币综述	黄成(204)
浙东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概述	包晓峰(227)
金萧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	
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	(241)
浙西抗日根据地综述	杨福茂(256)
新四军在浙西的反顽斗争	浙江省军区党史办公室(277)
苏浙军区四纵两渡富春江	中共富阳县委党史研究室(294)
永乐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概述	浙江省军区党史办公室(307)
虹桥起义始末	万邦联(317)
抗战时期“工合”运动在浙江	朱健(323)
抗战时期浙江正面战场述评	楼子芳(335)
浙江新四军的北撤	包晓峰(354)

# 抗战初期的浙江国共和谈

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七七事变前后，先后两次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进行合作抗日的和平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标志着浙江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一)

1935年2月，奉中央指示，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军挺进师，任命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进入浙江活动。同年10月，刘英、粟裕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举行联席会议，会后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挺进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成为党在南方8省14个革命战略支点之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停止对主力红军的进攻，但仍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对我南方各游击区的“围剿”。同年底，任命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主任，调集6个师，2个独立旅，以及地方保安团，共43个团，向浙南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围剿”。我军在战斗异常残酷的情况下，把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持下来。

当年闽浙边临时省委虽然和党中央失去联系，但不断搜集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刊，分析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从上海

出版的、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大众生活》等所透露的消息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并以这些材料为内容，在党内与部队中进行教育，使之对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宣传我党抗日救亡主张。如得知 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时，临时省委即发表《快邮代电》表示支持；1936 年 6 月发生两广事变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1936 年 9 月以后，省委主动对具体政策作了调整，如将“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将“欢迎白军士兵杀死官长拖枪当红军”的口号，改为“欢迎白军官兵枪口对外和红军共同抗日”；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委员会”；把用“打土豪”的办法筹款，改为征收“抗日捐”。并注意团结进步士绅和商人。同时，还将红军挺进师的番号改为“闽浙人民抗日红军”。这样，为国共和谈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了充分的政治、思想条件。

## (二)

1936 年 7 月，浙南地下党与上海地下党及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取得了联系。1937 年 3 月，由浙南地下党派往上海学习的吴毓回到温州，上海地下党交他带回当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送交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刘英当时在浙南的平阳北港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由于敌人层层设卡封锁，吴毓无法找到刘英，折回温州，与在温州的黄先河和黄耕夫、周饮冰等研究。他们根据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决定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触，进行试探。他们以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的名义拟了一份《快邮代电》，于 3 月 25 日分头从永嘉、乐清、瑞安、上海等地投邮，发给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

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温州、处州、衢州行政监察专员公署及有关县党部、县政府等。其主要内容是：呼吁国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派代表与我们谈判；双方保证谈判代表的生命安全；并提出平阳北港人士林奎、温宗周为双方联系人，约定会谈地点；建议对方登报答复我们。《快邮代电》发出以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继续在《东南日报》、《浙瓯日报》上制造舆论，把我党为挽救国家民族严重危机而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诬蔑为“投诚”；另一方面，派出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政训处长邓初和浙南驻军十九师旅长唐伯寅来到温州、平阳进行所谓“收编”活动。4月30日，《浙瓯日报》刊登了署名林奎、温宗周的《紧要启事》，暗示要我方派人与之联系。

《紧要启事》见报后，吴毓与黄先河从温州经瑞安在平阳腾蛟包垟找到刘英，汇报了以上情况。为此，刘英在大屯村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会议“估计这次谈判很少实现的可能，其原因：A、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政策的转变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B、根据当时的局势与实际地理环境，还有延长局部内战的可能；C、他们在军事上占了极大的优势”。但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独立与批判的自由和红军武装保持独立性这两个原则为退让最低限度”。会议决定我方条件基本上援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文所提出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以吴毓、陈铁军、董启文为我方谈判代表。

吴毓到了温州城，在新聚顺旅馆单独与林奎见了面。为了安全，吴毓带林奎到市区边沿的三育小学教师张达生处密谈。林奎自称是受十九师旅长唐伯寅的委托而来的，转达了对方表示愿意和谈的意思，并说谈判代表的安全不会有问题。第二天林奎陪同吴毓与唐伯寅、邓初见了面。吴毓以省委联络员的身份提出，如果对方有谈判诚意，建议停战1个星期，以便进入根据地向组织汇报。当

日中午，邓初在五马街醒春居酒楼宴请吴毓，十九师师长李觉、温州专员许蟠云以及唐伯寅等作陪。宴会后，双方初步交换了意见，对方同意先行停战，并以邓初为正式代表进行谈判。

会谈于5月在平阳山门和温州城举行，开始时，双方交换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看法，我方代表着重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深重，非团结不足以救亡，非抗战无以图存。对方表示愿意和谈。次日，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我方首先提出了：

一、闽浙抗日红军愿意改为国民革命军，根据国军的编制，直属南京军事委员会指导；

二、闽浙边区改为特区，在特区内实行民主选举，行政上按照国民政府的系统，国民党可以派代表或顾问参加；

三、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

四、停止没收地主的财产，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后的一切给养，由国家财政拨补；

五、闽浙红军改编以后，在特区内集中训练，准备对日作战。

同时，提出5点要求：

一、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一致抗日；

二、召集各党派各武装部队代表商讨救亡大计；

三、开放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

四、释放政治犯；

五、改善人民生活。

对我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国民党代表立即反对。他们提出早已准备好的4条：

一、闽浙红军接受改编，待遇与国军相同；

二、取消苏维埃赤化宣传，并停止赤化活动；

三、闽浙红军应随时听候调遣与指挥；

四、闽浙红军中的政治人员一律到南京受训后分发。

显而易见，国民党代表妄想在谈判桌上达到他们在战场上所

没有达到的消灭我党我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因此，我方代表严词加以拒绝，谈判陷于僵局。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方提出：闽浙抗日红军认为在国难当头的今天，不忍内战的再续，情愿舍弃一切，集中开赴抗日前线，要求对方保证行军路途的安全。对方代表表示要向上级请示。在谈判进行期间，国民党继续调动兵力，封锁交通要道，作好“围剿”我根据地的准备。5月18日，国民党公然以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参谋长的名义宣布，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即“停抚痛剿”、“灭绝根株”。后来，谈判地点转平阳鳌江。国民党代表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和平谈判完全破裂。5月22日，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这以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

和谈破裂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先后发表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和《呼吁各界人士要求闽浙两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揭露国民党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肆意破坏和谈的罪责。同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及时向党中央写了和平谈判破裂情况的报告，经上海地下党转送延安。

### (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7月8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即发出通告与宣言，再次敦促蒋介石、刘建绪“国难已到了生死存亡最后关头，应无条件的首先停止内战”。这时候，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党中央还以贺龙名义写信给刘建绪，晓以民族大义，敦促他与红军共同抗日；这样，促使刘建绪不得不认真对待我党的和谈建议。

8月下旬，刘建绪将6月上旬青田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的、原我方谈判代表陈铁军从衢州监狱中释放出来，并让他带回贺龙给

刘建绪的信以及刘建绪给关英、黄道、刘英的信，同意重开和谈。陈铁军在瑞安五云山根据地找到刘英，汇报了情况。省委决定由吴毓、黄耕夫为我方代表，8月24日，与刘建绪的代表邓初在温州申江旅馆进行第二次谈判。达成以下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

一、闽浙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按照国军的编制，待遇与国军相同；

二、闽浙红军在瑞、平、泰三县边界以峰门（在泰顺县境内）为中心集中，集中期限为半个月；

三、红军集中时，如遇国军与地方部队攻击，由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负责。如红军发生暴动，则由闽浙边省委负责；

四、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五、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会谈结束后，对方将关押在永嘉监狱内的张忍之、陈急冲、邓扫空等释放。此后，被关押在衢州、瑞安和平阳等地国民党监狱中的我方人员也陆续出狱。

8月27日，我方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通告》，要求我各部队迅速集中，以期早日实现对日直接作战；注意团结所在各地区的国民党驻军及一切地方武装部队，保护碉堡、电线和各种交通工具。但国民党方面没有及时将和谈的结果通知各县、各军，致使红军的行动仍然发生困难，未能在商定的期限内集中。

9月16日，邓初派了政训处上校处员王裕光、中校处员詹行烈到平阳山门，会见了刘英，双方作了进一步会谈。因为情况变化，商定红军集中地点改为平阳北港区，集中期限延到10月1日；将原协议“根据国军编制”改为“根据任务编制”；加上“目前宣传工作，根据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原则进行”这一条。关于今后部队调动问题，刘英表示必须请示我党中央才能决定；王、詹等同意留待以后进一步解决。

在谈判中，从国民党代表处获悉我党已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

事处。闽浙边临时省委即派龙跃、吴毓与王裕光、詹行烈同到杭州向刘建绪作礼节性的回访，然后到南京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谈判经过和请示工作。在杭州时，刘建绪节外生枝，提出要将闽浙红军改编为他的第十集团军的一部（他取个番号叫第一路抗日游击队），开到乍浦一带驻防。龙、吴重申我们的部队行动必须请示党中央，仅表示将他这一意见向省委汇报。

龙、吴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秦邦宪，汇报了情况。秦邦宪指示，部队集中后不要下山，防止国民党军队阴谋袭击。并说，周恩来正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谈判，拟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他规定：在新四军组成之前，没有他的亲笔信，任何人不能调动部队，并将上述情况给刘英写了亲笔信，信中转述了党中央8月1日《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

龙、吴回来时经过杭州，再去见了刘建绪，把国共两党中央谈判组成新四军的消息告诉他，说明我们的部队将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我军仍继续在原地集中训练。刘建绪不再坚持要我军开赴乍浦的意见。

在温州国共双方和平谈判的同时，闽浙边临时省委另一领导人粟裕正在浙西南遂昌门阵一带活动。他仔细分析了从金、衢不断传来的各种传说，认为有可能是国共再次合作，便派刘亨云带了一支小部队化装为国民党军队，下山收集情况。经证实国共双方已再次合作，就给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发了《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10月14日国民党遂昌县长林树艺派军事科长朱镇山等人为代表，到门阵与我方代表谢文清、刘清扬进行谈判。对方请我们下山进城，我方提出：一、我们将开赴浙南地区整训，沿途不得留难；二、我们已停止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三、双方是平等合作，我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进城。对方同意我们的意见，达成了协议。粟裕便率领部队开赴平阳北港，与刘英会合。

综上所述，先后两次和平谈判，是在国民党8个月“围剿”的严

酷环境中，闽浙边临时省委主动争取、坚持下进行的。由于全国的形势发展和党中央政策的正确，以及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和平谈判和贯彻协议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在统一战线政策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权，省委机关和部队一直没有离开原根据地，使国民党在谈判桌上和在战场上，都无隙可乘，保证了谈判的顺利进行。

#### (四)

1937年10月，挺进师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在平阳北港山门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由粟裕任队长，刘英任政委。随后临时省委在山门大屯举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在山门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作战训练和政治工作，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12月1日，根据和平协议，我党在温州设立了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办事处，主任吴毓。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平阳山门，传达上级指示，决定由粟裕率领抗日游击总队及抗日救亡干校部分学员组成的随军服务团，共400多人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3月18日自山门出发，开赴皖南，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由于浙江的战略地位重要，原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决定刘英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

3月，刘英与曾山一起去南昌向东南分局汇报工作，在金华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进行一次会谈。会谈结果，黄绍竑同意：一、发给我军子弹5万发，军衣1000套；二、我党在浙南地区设立3个办事机构，即在温州城内九柏园头设立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周饮冰；在平阳北港水头街设立新四军闽浙边留守处，主任黄耕夫；在丽水高井巷设立新四军浙江办事处，主任吴毓。

1937年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谈判的成功，既保证了我红军挺进师部队顺利地完成集中、改编和开赴前线的任务，又保存了原浙南游击根据地，开创了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原载《光辉的历程》）